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 參政 1945—1949

●許紀霖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社會變革和動盪最激烈的年代，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衝突互動構成了歷史變遷中的中心圖景，希望與失落、突變與退歸、亢奮與冷漠……構成了一幅幅交替顯現的戲劇性場面。不過，在這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雙峰對峙中，有一群知識分子高揚自由主義的旗幟，頑強地在夾縫中奮鬥，希冀以和平、理性和民主的力量開拓出中國政治的新格局。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段落裏，他們只能處在社會的邊緣地帶默默地積蓄自己的能量，到40年代後期，尤其是1945至1949年間在種種歷史機遇刺激下，驀然產生了參政狂潮，發展成一股波瀾壯闊的自由主義運動。本文所要檢討的就是這段不尋常的歷史。

一 知識分子參政的三種樣式

自由主義之於中國基本上是一舶來品。作為一種西方政治哲學，自由主義視個人自由為最高、終極性的價值，政府是必要的、也是必須限制的「惡」，只有通過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社會每一個體的自由權利。因此在工具性價值上，自由主義亦可等同於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來到中國之後，從一開始就被作為一種社會變革的工具性價值加以引介闡釋，其捍衛個人自由的終極價值悄然隱去，而凸現了其民主主義的工具價值，主張以和平、理性、漸進的方式變革現實秩序，實現歐美式的現代多元社會和民主政治。在國共對峙的年代，這種溫和的自由主義通常被稱作「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

在中國，自由主義的社會載體主要是城市的知識分子階層。自由主義的目標之一在於變革現實政治秩序，那麼知識分子勢必面臨着一個政治參與的問題。中國知識精英的參政意識在歷史上淵源流長，早在先秦時代就發育成熟，承擔「弘道」使命的士通過個人參與政治系統，以自己的道德和智慧影響王權，

在這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雙峰對峙中，有一群知識分子高揚自由主義的旗幟，頑強地在夾縫中奮鬥，希冀以和平、理性和民主的力量開拓出中國政治的新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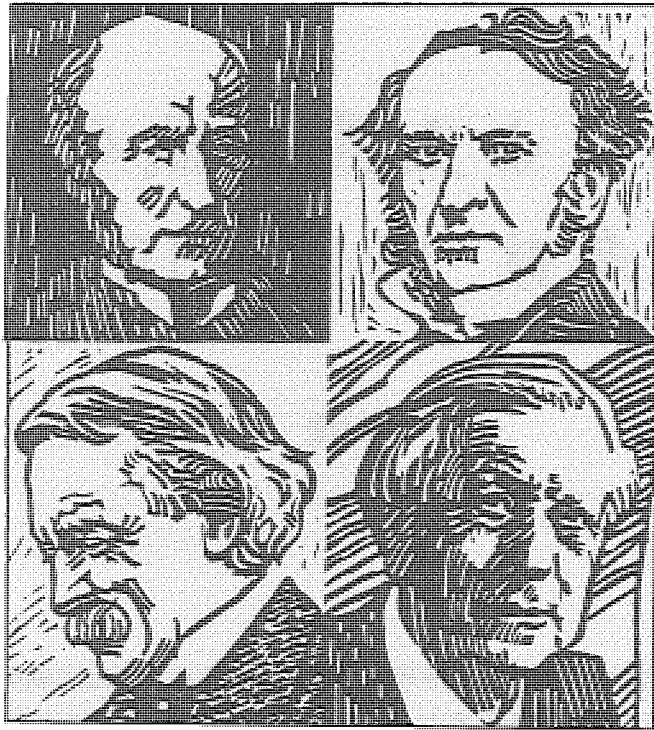


圖 作為一種西方政治哲學，自由主義視個人自由為最高、終極性的價值。

中國自古以來並無西方教會那般獨立於政統的道統組織，知識分子參政所憑藉的唯有個人的道德資源，而全無組織化的社會資源保障，其身分也是王權系統下依附性官僚而已。

從而實現「以聖控王」的理想。然而中國自古以來並無西方教會那般獨立於政統的道統組織，知識分子參政所憑藉的唯有個人的道德資源，而全無組織化的社會資源保障，其身分也是王權系統下依附性官僚而已，因而一旦遭遇昏君，不但不能「弘道」，反而常常為王所控，一無作為。這一情形到二十世紀初開始有所改觀，社會經濟的多元化營造了一大批以創造和傳播抽象符號系統為己任的自由職業，獨立的知識階層第一次從政治系統中剝離下來，崛起於民間社會，這就為知識精英參政樣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間。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參政的樣式不外乎三種。第一種是以個人身分加入政府，成為職業官僚。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尤其到30年代，相當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政治系統，像王世杰、張道藩、翁文灝、蔣廷黻等人還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職。但是，他們的角色一經轉換，就很難在行政官僚的既定職能與自由主義信念之間保持適意的平衡，多少陷入了傳統士大夫「為王所控」的尷尬困局。與蔣介石最接近的陳布雷最得個中隱痛，當年他就感慨萬千地對別人嘆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豈能甘於此哉！」^①

第二種是繼續以知識精英的身分留在民間社會，與政治系統保持一定的距離，通過大眾傳媒工具批評時政。這種「書生議政」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政的基本樣式，也即胡適所提倡的對政治保持「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的立場。傅斯年曾經強調說：為了「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既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②(着重號係原文所有)。事實上，在40年代之前中國自由主義參政渠道主要表現在輿論的干預上。一些著名的自由主義雜誌如

《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再生》、《主張與批評》、《獨立評論》等等，無論在軍閥政治暗無天日，還是激進主義浪潮洶湧的時候，都保持自己獨立的理性聲音，對中國政治文化環境起到了影響和滲透的功能。然而，由於中國政治系統的自封閉性，這種輿論議政未能介入政治運作的實際過程，也就難以呈現它的現實政治功能。

1938年國民參政會的建立，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了一個能夠直接影響中央決策的渠道。但影響並不同於參與，參政會的諮詢性質使「參政」多少顯得徒有其名，政治運作依然如舊。在此情形下，一部分自由主義參政員意識到要在政治舞台上發生影響，必須聯合組黨，形成獨立於國共之外的第三種力量。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的成立，象徵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政樣式的某種轉換，從個人身分參政和輿論議政朝着以組合組黨、強行打入政治系統的第三種參政樣式演化。只是由於客觀形勢的惡劣，民盟的政治功用當時還顯示不出來，隨着抗戰勝利局面的來臨，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以民盟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度登上了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演出了一幕耐人尋味的歷史悲喜劇。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象徵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政樣式的某種轉換，從個人身分參政和輿論議政朝着以組合組黨、強行打入政治系統的參政樣式演化。

二 戰後的「參與爆炸」浪潮

戰後的中國處於未來發展的十字街頭，歷史再次給予中國人以選擇自己政治生存方式的難得機遇，究竟何去何從全憑自己的把握與各力量之間的較量對比。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使得社會各階層和各利益群體得到了高度的社會動員，在這歷史抉擇的緊要關頭，他們的政治熱忱如同火山一般噴發出來，形成空前絕後的「參與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浪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參政熱」中充當了最積極的角色。這種角色感首先來自於對自身的反省和強烈的贖罪心理。青年黨領袖左舜生認定，「過去五十年中國之所以不能有一種真正的憲政出現，其大部分的責任，應由中國的知識分子負之」，因為「他們只知道如何去找一個可以使我們升官發財的主子，而決不敢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張。」^③自責的語言相當尖刻，透視出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肩負歷史十字架，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精英意識，並由此產生真誠的贖罪心理。周建人在1945年秋天寫道：「中國人民多數不識字，我們卻是識字的人民，比較有時間與發表意見的機會的，如果還是不說話或說話太少，讓專制勢力伸長上去，在良心上實在是犯罪的，便是犯了不盡人民說話的責任的罪。」^④這種「盡良知」的態度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出來說話、參與政治的真實動機，其中一些活躍分子則對知識分子在多元社會中的角色體認則更加自覺，意識到在國家權力的下面，必須營造一個足以與之抗衡的民間社會，「一個國家安定並不完全依賴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還需要有一種可以造成社會安定的力量」，這力量便是中產階級及其與之相聯繫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⑤。這一切構成了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現實心理背景。

戰後的自由主義運動同時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層面是和平民主的意識形



圖 《觀察周刊》在風雨飄搖之際，接過民盟和胡適放棄的自由主義旗幟，繼續發出自己獨立的声音。

態宣傳和對政治過程的輿論監督。在1946年，僅僅在國民黨管轄區域正式登記註冊的報刊雜誌就劇增到984家，而實際達到1832家，總發行量為200萬份，其中新增報刊中相當大比重是社會政治類時評刊物，這表明大眾傳媒和讀者群的某種心理傾斜。當時在輿論界較有社會影響的報刊有《大公報》、《文匯報》、《客觀周刊》、《民主周刊》、《平民》、《聯合增刊》等，而最具權威性的要數1946年9月創刊的《觀察周刊》。這份由儲安平主編，標明「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八字宗旨的時評刊物雲集了一批最著名的自由主義作者，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筆調吸引了全國大量知識分子讀者，銷量從400份上升到100,500份，左右着輿論界自由主義運動的風向。

另一個層面是直接的組黨參政。在「參與爆炸」的1945、46年間，中國突然出現了一股組黨狂潮，約有近百個政黨在各地宣告成立或公開活動。其中幾個較大，較有社會影響的黨派，如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中國農民黨，基本上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成。中國顯然有士大夫政治的悠久歷史，但由於「君子群而不黨」的觀念根深蒂固，向來匱乏反對黨的政治傳統。歷史演進到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參政樣式從個人清議、進諫、入閣發展為大規模組織反對黨，不啻開拓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全新格局。不僅要有政黨，而且要造成一個「第三大黨」。羅隆基早在1945年春天就公開提出了這樣的號召。自然在羅氏和一般人的期待中，這「第三大黨」非民盟莫屬。當時它已擁有三千名黨

「第三大黨」民盟擁有三千名黨員，大多為知識界精英，遍佈全國主要城市。在歷史轉折的關鍵眼上，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所在。

員，大多為知識界精英，遍佈全國主要城市。這樣，在歷史轉折的關節眼上，民盟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所在。

三 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大憲章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佈民盟為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其神聖使命是「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⑥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大憲章。

戰後國際民主潮流的湧起，極大鼓舞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信心。民盟的報告指出：「這種國際環境，這種世界潮流，同時亦就確定了中國的前途。明白些說，今後的中國，非成立一個民主國家不可。因為非民主的國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沒有存在的機會」^⑦。這種斷然的判斷，表明在他們心目中民主前途不僅是「應當」的，而且是「必然」的，不是一種價值選擇，而是一個事實（時代潮流）順從的問題。類似這樣的言論，充溢在戰後的報刊書籍，自由主義取得了宣傳上的勝利。不過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這些當年的文字，就會發現其中大多失之於理論的膚淺和思想的蒼白，對民主的闡釋也頗有偏頗之處。中國的自由主義運動長期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啟蒙，不注意發掘背後的價值資源，以至於學理底蘊不足，竟成為一個由來已久的思想現象。

民盟綱領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社會、婦女諸方面，其主要精神乃是「歐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蘇聯的經濟民主」，抓住了當時中國若干重大問題。然而細細推敲，我們仍可發現其理論與中國現實有着某種歷史性的錯位。自由主義過於訴諸理性而排斥激情，拒絕任何帶有終極目的的烏托邦設定，民盟綱領所提供的就是一幅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的民主藍圖。民主的宣傳會煽起城市知識分子的政治熱忱，但難以產生神話般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整合功能，而變革時代負有社會改造使命的意識形態必須具有高度的社會動員能力，在當時這樣一個無信仰的混亂年代，最好的社會動員也許就是政治神話加現實承諾，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就顯出其短拙所在。中國社會的核心危機潛伏在內地和廣大農村，那裏最匱乏的主要還不是自由、民主、人權，而是更基本、更實在的土地、溫飽和安定。而這一切，自由主義從來沒有作過任何許諾，也沒有拿出任何操作性的方案，它的目光只盯住城市，而漠視危機四伏的鄉村，以至於與中國最大的改朝換代社會資源農民嚴重疏離，也就無法扭轉以後出現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歷史走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盟經濟綱領中，其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是以蘇聯為示範的「平均財富」，保證公共事業與獨佔性企業的「公營原則」，其餘的才是私營地盤；主張由國家制定統一的經濟計劃，消費品分配也以國營和合作社為主，節制私人商業^⑧。類似這樣的主張，在中國自由主義黨派那裏具有普遍性，鮮有例外^⑨。中國的自由主義僅僅指政治、文化層面而言，在經濟層面上幾乎全都歸屬於社會主義。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歷史上就具有與官僚精英混然一體，而

民盟綱領主要精神乃是「歐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蘇聯的經濟民主」，抓住了當時中國若干重大問題。但難以產生神話般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整合功能。

恥於與工商精英為伍的傳統，進入現代化變遷之後仍無根本改觀。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觀念上也懂得「要中國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國有一個有力的中產階級」^⑩，但他們與現代經濟生活全然隔絕，不知中國不是苦於私人資本主義太發達，而是在統制經濟與外國資本雙重擠壓下日趨衰落，因此一談到具體的經濟問題，就相當自覺地與中產階級劃清界限，而追隨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古老的大同理想。本來，中國自由主義所憑藉的社會資源只是城市的中產階級與部分溫和的知識分子，但是中產階級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僅在現實社會關係上相當疏遠隔膜，而且在經濟觀念上還處於緊張的邊緣，這就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僅僅是一場孤掌難鳴的知識分子運動而已。

理論的誤導往往是運動挫敗的前兆，然而在1945年秋天，知識分子們正處於精神的分外亢奮之中，誰也不可能坐下來冷靜地思索探究一番。

中產階級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僅在現實社會關係上相當疏遠隔膜，而且在經濟觀念上還處於緊張的邊緣，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僅僅是一場孤掌難鳴的知識分子運動而已。

四 曇花一現的參政高峰

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够在戰後形成波濤洶湧的運動，主要得益於國共之間暫時的實力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1945年秋到1946年春千載難逢的和平瞬間。在複雜的國共和平談判中，中間勢力突然成為政治天平上一塊你爭我奪的砝碼，國共兩黨誰爭取到這個盟友，誰就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和政治的主動權。美國也異常看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分量，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為扶持一個美國觀念的自由主義政黨傾注了頗多的心力，多次強調拯救中國的希望在於「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分子居於領導者的地位」^⑪。這樣，民盟以及自由分子在1946年初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地位戲劇性地扶搖直上，如日中天。以出席代表人數為例，原定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和社會賢達各九名，由青年黨從民盟中分裂出去佔了五名，中共提議並經國民黨同意，由共產黨讓出二名，國民黨讓出一名，並另增二名以確保民盟的九名代表額，這樣民盟就成為出席政協人數最多的黨派代表團。

經過艱苦的談判，政協通過了五項決議，它們幾乎是民盟綱領的翻版，基本體現了民盟追求的政治目標。這一紙協議的達成，不外是國共兩黨相互妥協，民盟「漁翁得利」的結局。羅隆基當時興高采烈地對馬歇爾分析時局：「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⑫ 民主的前景幾乎一片光明，自由主義運動達到了歷史上的頂峰。然而風雲突變，由東北問題引發的國共內戰從關外打到關內，和平民主的前景轉為黯淡。民盟為調解國共、實現政協決議作了頑強的努力，甚至在國民黨攻下張家口，宣佈單方面召集國民大會，大家都驚呼「和平已經死了」的時候，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懷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信念，攜手上演了十月南京調停的一幕。正是這一幕，暴露了他們在充當政治角色時種種先天性缺陷。

在這場調停中，民盟居於核心的地位，但它有其難以言說的苦衷。首先是匱乏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礎。由三黨三派聯盟演變而來的民盟雖然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但各小黨派都有着各自的政治信仰，從歐美的黨政主義、國家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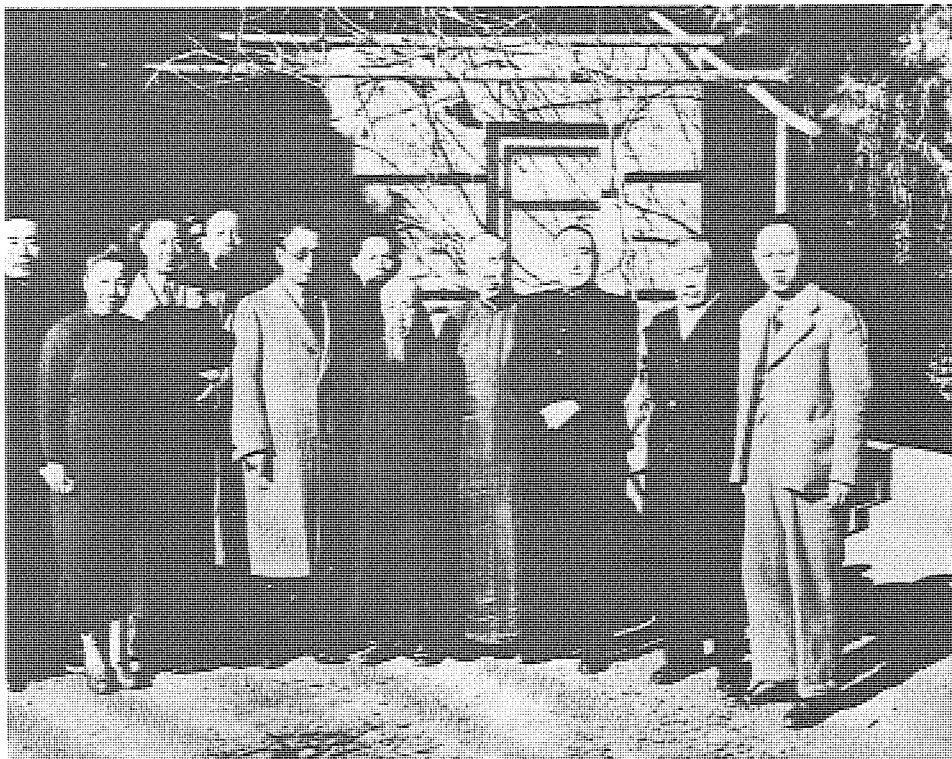


圖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是「學者兼政」，有書生意氣和浪漫主義氣質，不善於在政治遊戲中化理論為行政。圖中左起：周恩來、鄧穎超、羅隆基、李維漢、張申府、章伯鈞、沈鈞儒、董必武、黃炎培、張君勱、王炳南。

到中國的民粹主義，不一而足。信仰的不同常常會導致對具體問題看法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各行其事，政協前夕青年黨鬧分裂以及後來民社黨單獨參加國民大會都是民盟內部長期政見不合的積累效應。政治信仰的疏離也造成組織系統的渙散，作為一個現代法理型政黨，民盟雖然有其書面的組織活動規則，但由於黨內有黨，主義多歧，實際權力運作只能按照原來三黨三派時期遺留下來的派系協調原則進行，民盟決議對成員並無嚴格的約束力，黨員的自由度很大，而起着軸心作用的幾個主要領袖除了在自己所屬的派系，在全盟缺乏普遍的權威。

更重要的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大都是「學者兼政」型的人物，多的是書生意氣和浪漫主義氣質，不善於在政治遊戲規則中將理論主張落實為具體可操作的行動方案。他們出於儒家的社會使命感臨時客串政治角色，內心還眷戀着久棄的專業，盼望能早日脫離政治，回到書齋。最典型的是這場調停的中心人物梁漱溟。梁氏在抗戰結束時便欲卸甲歸田，經再三挽留才勉強擔起民盟秘書長要職。他性格剛勁有餘，韌勁不足，缺乏政治精英所必需的政治經驗和行政能力。當和平方案一時難產，這些身負歷史重任的知識分子竟個個人心思散，幾乎不戰而潰，梁氏本人也不耐煩起來，在未充分徵求國共雙方及軍事專家意見的情況下，就想當然地炮製出一個軍事調停方案。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方案中規定共產黨在東北的駐軍地點為齊齊哈爾、北安和佳木斯，但正如梁氏後來所承認的：「罪過得很，這些地點各在哪裏，當時我都未搞清楚！」^⑬這樣的方案引起的反應自然可想而知，十月調停流於失敗。自由主義運動的「黃金時代」如過眼煙雲，曇花一現。

由三黨三派聯盟演變而來的民盟雖然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但各小黨派都有着各自的政治信仰，起着軸心作用的幾個主要領袖除了在自己所屬的派系，在全盟缺乏普遍的權威。



圖 在多數人加速左右兩極分化的紛亂時刻，梁漱溟退出了政治上激進與保守之爭，回到文化建國的立場。

五 兩極分化與最後的堡壘

自由主義有其特殊的生長環境，理性、法治、秩序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態條件。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出現也是十八世紀之後的事，此時歐洲現代社會的多元格局已成，自由主義適逢其會，在認同現實秩序的前提下推行「社會改造細部工程」。然而，中國的自由主義不幸處在一個充滿暴力、血污和混亂的年代，掙扎於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夾縫之間，聲音微弱，時運多舛，一旦其作為政治角逐中砝碼的作用消失，就處於相當艱難的境地。本來，自由主義陣營只是「一個貌合神離的團體，而所以能勉強集合起來，完全是由於實際的政治環境逼成的」^⑭，而一旦國共成水火之勢，逼迫他們作非此即彼的選擇時，就自然從聚集走向分化。

民盟由獨立中立被一步步逼向激進主義。1947年初民盟二中全會宣佈將繼續在國共之間「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為實現政協決議而奮鬥，1947年5月在國民參政會議上又發起和平運動，呼籲國共立即停戰，恢復和談。然而陷於全面危機中的國民黨已不能再容忍民盟、民建、民促這些「異端」的自由主義政黨存在，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在該年11月民盟在政府的強迫命令下宣告自動解散。政府對自由主義的過度反應活生生地將這批溫和的知識分子趕到了共產黨一邊。儲安平當年辛辣地指出：「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到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卻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⑮ 1948年以後，民盟等一些民主黨派流亡到香港，恢復組織，發表聲明，公開宣佈與國民黨決裂，放棄「中間路線」，支持中共的武裝革命。隨着國民黨大勢已去，愈來愈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秘密奔赴解放區，一邊倒向共產黨。

與此相反，另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轉向了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雖然也不滿國民黨的腐敗保守，但在共產主義的「洪水猛獸」威脅之下，他們的邏輯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為國民黨幫忙。民社黨領袖張君勱1946年底在是否參加國民大會問題上最後投向國民黨遵循的就是這個邏輯。他明白國大的召集違背了政協決議，國民黨「還政於民」也多少是一政治姿態，中華民國憲法即使通過也未必意味着法治的到來，但是在他看來，無論政府如何保守腐敗，它畢竟是維繫合法秩序的重心，失卻了這個重心，國家就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動亂之中；因此，只要政府有些微進步，「我們豈有不幫助使他向上的理由」，「有憲法終比無憲法為好、為進步、為更接近民主一些」^⑩。一般而言，自由主義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場，它必須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倘若一旦無條件地支持政府，尤其是一個已經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政府，其就喪失了自由主義的靈魂。與張君勱相仿，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胡適在40年代後期也轉向了政治保守主義。他在戰後基本埋頭於北大校務和學術研究，沒有像20、30年代那樣通過辦時評雜誌，發出獨立的聲音，領一代自由主義之言論風騷。胡適雖然一再謝絕了政府任職，但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野，是為了「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⑪在政府合法性資源加速流失的時刻，胡適、張君勱等人都十分自覺地與國民黨同呼吸，共存亡，在公開場合毫無保留地千方百計維護政府的權威和形象，最後都忍痛告別大陸，流亡海外或隨國民黨逃往台灣。

在多數人加速左右兩極分化的紛亂時刻，仍然有由少數知識分子頑強地堅守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超越「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現實邏輯，堅持甚麼也不選擇。梁漱溟退出了政治上激進與保守之爭，回到文化建國的立場。他檢討民主政治失敗的原因，認為「若沒有對整個文化問題先有其根本見解，則政治問題的主張是無根的」^⑫。他暫時退出了意識形態的整體話語，躲在北碚撰寫《中國文化要義》，清理自己的思路，重構文化的個體話語。比梁氏更難得的是，《觀察周刊》在風雨飄搖之際，接過民盟和胡適放棄的自由主義旗幟，繼續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楊人楩教授在1948年秋天寫道：「在目前國共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中，最現實的態度是『擇一而事』。要兩面討好是不可能的，兩面不討好是最不『現實』的，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保持緘默，待機而動，自由主義者卻要採取這麼一種既不現實又不聰明的態度：因為科學的精神使他們有這麼一種認識，他們的認識決定了他們所採取的途徑。」^⑬儲安平、楊人楩、施復亮等最後一批自由主義者不為現實利害所左右，拒絕政治選擇的邏輯，堅持以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評判一切，對國共兩黨始終保持一種冷峻的審視目光。呼應《觀察周刊》的，在上海有王芸生主筆的《大公報》，在北平有大學教授主辦的《新路周刊》。這些自由主義最後堡壘的守護神們在40年代的中國終究難圖自己的理想之夢。畢竟，不是由他們選擇時勢，而是由時勢選擇他們。隨着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自由主義運動化為茫茫大海中一抹渺無聲息的浪濤，封存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直到有一天重新被人發掘出來為止。

一般而言，自由主義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場，它必須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倘若一旦無條件地支持政府，尤其是一個已經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政府，其就喪失了自由主義的靈魂。

在多數人加速左右兩極分化的紛亂時刻，仍然有由少數知識分子頑強地堅守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超越「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現實邏輯，堅持甚麼也不選擇。

註釋

- ① 王泰棟：《陳布雷外史》，頁110。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 ② 傅斯年致胡適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170。中華書局，1980。
- ③ 左舜生：〈談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憲政》，第2期，1944年2月1日。
- ④ 周建人：〈讓人民應該多說話〉，上海《民主周刊》，1卷3期。
- ⑤ 儲安平：〈中國未來局面中的一個安定因素〉、〈中產階級及自由分子〉，《客觀周刊》，第7、12期。
- ⑥⑦⑧ 《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頁87、72-73、67-68。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 ⑨ 唯一例外的是與中產階級有較多現實和精神聯繫的民主建國會，該黨政綱強調「國營事業之官僚化與私人企業之獨佔化，同為經濟建設之大敵，以我國現勢而論，前者之危機遠過於後者」，主張私人有充分的經營自由，不得有更多的法律限制。
- ⑩ 儲安平：〈知識分子·工商階級·民主運動〉《客觀周刊》，第12期。
- ⑪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卷，頁700。
- ⑫ 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參加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頁230。
- ⑬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頁215。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 ⑭⑮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周刊》，2卷2期。
- ⑯ 張君勱：〈兩黨共同勉勵：在成都青年黨招待會上的演講〉《再生》，第245期。
- ⑰ 胡適致傅斯年信，同註②書，頁173。
- ⑱ 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上海《大公報》，1947年1月12日。
- ⑲ 楊人楩：〈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觀察周刊》，5卷8期。

許紀霖 1957年生於上海，曾在華東師範大學獲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碩士學位，現為上海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近年來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課題，代表性著述有《無窮的困惑：近代中國兩個知識者的歷史旅程》、《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以及五十餘篇論文。